第一章　　导论

儒家传统文化是产生和形成于中国先秦时代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思想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被中国人称为“圣人”和“亚圣”的孔子与孟子。他们的思想学说经过其弟子及后人的传播与阐发而进一步发扬光大,在中国历史上曾被尊奉为“孔孟之道”,备受历代统治者及士人学者的推崇。其后经过整理编纂的《四书》、《五经》基本上囊括了儒家文化的主要经典[1],成为古代中国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跻身管理阶层的必修科目，也成为历代中国统治者从事国家政治管理的思想营养，世间曾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2]。这足以说明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管理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人类文明已经从“工业革命”时代健步走向“信息技术革命”的知识经济时代，现代管理如何面对儒家传统文化依然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一道难解的命题，这就促使有志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人们关注儒家传统文化与管理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研究，因而有关儒家传统文化与管理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正在中国管理学界方兴未艾地开展起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一节　一场文化论争的社会意义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在中国古代两千余年的封建政治时代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和发挥主体作用，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方向和价值导向。虽然期间曾经有过几次大的发展与嬗变，但其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仍然是中国古代超稳定社会结构的思想基础和民族心理文化积淀的内驱动力[3]。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用坚船利炮敲开了古老中国长期以来闭关锁国的大门，军事的入侵自然伴随着经济的掠夺和文化的输入。中国大地上不仅散发着浓烈的火药味，而且弥漫着传教士恣意的叫声。被践踏和被蹂躏的中国人猛然意识到儒家传统文化熏陶下的泱泱大国已不再是昔日盛唐时代百国朝服的繁荣景象，而是一个经不起一搏风烛残年的耄耋老人。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和如此被动挨打的局面，一批先期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开始了民族拯救与国家复兴的探索之路。这种情况下他们首先必须面对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就成为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的关系问题。期间先有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其后又有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而后又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革故鼎新、变法图强”的思想与行动。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始终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儒家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因而他们的种种努力只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无法挽救中国不断危亡的历史和不断沉沦的现实。由于儒家传统所固有的结构形式和思维特征而不能实现内在的自我超越，因而在解决复杂多变的现实矛盾面前就显得苍白无力，成为禁锢人们思想解放

和精神自由的桎梏。

“五四运动”以来,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扛起了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大旗,从而在中国现代史上掀起了一场“传统”与“现代”论争的大潮。这场论争承继了中国近代以来关于儒家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形成了激烈的碰撞和尖锐的斗争。西学反对中学,新学反对旧学的论争表现得异常尖锐和激烈。一方面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是以梁启超、张东荪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方面是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所主张的“全盘西化论”;一方面是以梁漱溟、钱穆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所主张的“中国文化本体论”;一方面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对儒家传统文化无情地批判而形成的启蒙主义运动,一方面是以冯友兰为代表的传统主义者对儒家文化倾注的热情而产生的“新儒学”……正当这场文化论争此起彼伏,东方的黎明显现出一道微弱的曙光之时,发生在中国 30 年代的抗日救亡运动不得不使这场文化论争暂时告一段落。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抗日压倒论争,救亡压倒启蒙,激烈的文化冲突自然而然地让位于尖锐的民族矛盾[4]。由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正确主张和富有成效的工作,因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最终赢得了中国民众的信赖和拥护。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选择的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前苏联“斯大林模式”下的管理体制,因而马克思主义文化便作为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必然选择而成为惟一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况下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论争似乎再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人们的思想认识高度集中和统一于惟一的思想文化。统一的思想便于统一的行动。然而这种统一的思想和行动往往容易诱导人们盲目的从众心理。意识形态的惟一性必然导致社会生活的片面性,容易产生极端主义的行为倾向。这正是中国自现代以来之所以能够发

生像“反右问题扩大化”“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历史性错误的文化根源所在[5]。

进入 80 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又一次面临着文化选择的问题，面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和西方思潮的涌入，一场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文化热潮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传统文化论”与“全盘西化论”的对立与冲突，“中体西用论”与“西体中用论”的分歧与差异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化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和思想倾向，反映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选择的艰难曲折。在这种对立与冲突的文化选择中，又有人提出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论的观点。他们的这种主张是基于以下的基本事实 即 70 年代以来，处在东亚地理位置的日本，特别是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出现了迅猛发展的强劲势头，形成了东亚经济特有的东亚模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种强势力量。在探讨东亚经济腾飞的原因时，人们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得益于高度集中和有效的政府干预，而支持这种经济模式的精神动力则是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这种文化强调团队精神，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和个人的修养，提倡顾全大局和维护家庭稳定,更有敬老爱幼、待人以礼、重视教育、勤俭节约的民族情感和优良传统。正是这种儒家文化促进了东亚经济的繁荣与腾飞。然而很不幸的是在这种观点支撑下的东亚经济模式被 90 年代随之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得土崩瓦解、灰飞烟灭。事实恰恰说明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东亚经济模式仍然不像建立在现代文明基础之上的西方经济模式那样坚挺。“亚洲金融风暴”终于打破了儒家文化在现代经济中无所不能的神话[6]。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在何种程度和意义上对现代管理有用或者有效。

第二节　现代管理关注的儒家文化

近年来在中国兴起的管理学热潮是中国社会制度革新和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必然结果。伴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民营企业崛起并发展壮大和世贸组织的加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对于民族国家来说则意味着必须承受放弃某些传统的痛苦，然而放弃经济全球化的选择将会使民族国家付出更加沉重的代价。管理学热潮在中国的兴起无疑能够促进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与现代中国的管理实践相结合，能够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同国际接轨，也能够使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和企业家坐在平等的板凳上对话。这样以来，有关儒家传统文化与管理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就会进一步凸显出来。而儒家传统文化与管理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仍然是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文化选择问题上关于“传统”与“现代”关系问题在管理领域的再现。或者换一句话说就是儒家传统文化如何现代化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关于传统文化与管理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研究上一直存在着重历史轻现实的倾向。在本人所涉猎的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管理现代化研究的文章或著述中，几乎毫无例外地认定儒家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管理所具有的正相关作用。而支撑他们这些理论观点的恰巧是儒家经典言论的大量引证。这些经典言论的引证对于一般人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中国的学术研究始终长于事实判断而非长于逻辑推论。事实判断往往强调观点与材料相统一，而逻辑推论则十分重视材料与观点之间的逻辑推论是否成立。这种情况说明了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国学术研究与西方学术研究之间的巨大差异性，表明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7]。即：

中国 观点＝事实 1＋事实 2＋事实 3＝事实认定

$$\text{西方 观点}=\begin{cases}\text{事实 } 1\\ \text{事实 } 2\\ \text{事实 } 3\end{cases}=>\text{逻辑是否成立}$$

正是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一些研究管理学的理论工作者都把儒家传统文化对于现代管理的影响和作用抬到了至高无上和无以复加的地位。似乎儒家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国现代管理的金钥匙，是有效医治中国现代管理中各种问题和弊病的灵丹妙药。从而忽视了对现代管理中许多现实问题和具体问题的实证分析与应用研究。这正好说明中国当前学术研究的幼稚和浮躁。中国的学术浮躁就像中国当年的泡沫经济一样，虚拟的繁荣背后往往孕育和潜伏着极度的疲软和深刻的危机。建立在这种思想理论背景下的公共政策及其管理模型自然缺乏现实的基础和实际操作的可能。这正是当代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走不出困境，民营企业不能得到健康成长的根本问题所在。

认定儒家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管理具有正相关作用的人们，始终是基于对以下基本假设的“真实”认定：

一、儒家传统文化中有或者应该有关于管理思想的部分内容；

二、儒家管理思想中有或者应该有关于现代管理有用的部分；

三、儒家管理思想中有或者应该有促进管理现代化的某些因素。

这些基本假设奠定了理论研究的基础。通常情况下人们在潜意识里将这些基本假设奉为圭臬。同时这些基本假设也影响了人们心目中把那些理论视为“真实”的认定。这种对于真实的根本假设决定了这一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以及对于“事实”的观点，而实际

上更界定出了整个学术研究的基本范畴。基本的假设决定了什么是应该加以注意，什么是应该弃置或忽视的部分。美国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F Drucker)在其《21 世纪的管理挑战》一书中指明:‘假设’对管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而言,其实远比‘范式’对自然科学还来得重要。范式即所谓一般公认的理论，对自然界并没有影响。范式声称太阳绕着地球转，或者相反，说地球绕着太阳转，对太阳与地球毫无影响。自然科学研究的是物质世界的行为，但是像管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对象是人和人类社会的行为。因此人们倾向于根据该学科的假设采取行动。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学的现实 - - 物质宇宙和它的规律，都固定不变（或是改变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而不会在几世纪、更不会在几十年内出现变化）。但是社会的宇宙没有这类‘自然律’(natural law)。它不断变化,这就意味着昨天仍然成立的假设，今天可能不成立，甚至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全错误。”杜拉克指出了假设对于管理学研究的极其重要性，同时也指出了任何基本假设的发明都将意味着新的理论成果的出现。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关儒家传统文化与管理现代化关系问题研究的基本假设一直是研究者们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基本范式。这一范式不论是在研究、著述，还是在教学、实务各方面都相当接近现实，而且能够发挥功效。但是现在这些假设已全数过时，几乎快要变成一种讽刺。因而现在正是仔细检视这些假设，并创立一套新假设，作为儒家传统文化与管理现代化关系问题研究的适当时机。

第三节　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的范式

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本研究无意去接受人们已有的现成结论和有关事实的“真实”认定。在前面的研究里我们已经提及假设对于管理学研究的重要性，因而假设对于我们研究儒家传统文化与管理现代化的关系同样至关重要。事实上任何社会科学对事实都有其自成一套的基本假设。这套假设构成了这门学科研究的范式。对于儒家传统文化与管理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研究来说，创立一套自成系统的假设是比较困难的事情，而这样一套假设的建立则意味着对原有假设的改变和对事实的重新认定。也许这种假设不能被现在的人们所接受，或者在将来很长的时间不能被人们所接受。但是现实却促使我们必须去这样做。这种现象在西方的管理学研究中同样存在，早期一位有远见的管理学家佛雷（Mary Parker Follett）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佛雷的假设与当时（20 世纪 30、40 年代）萌发的主流管理理论不合。因此她生前藉藉无名，在她去世后，她的理论仍继续被埋没了 25 年之久。然而今天我们知道，她于社会、人群和管理的基本假设远比当时、甚至今天管理专家们仍大致采用的理论更接近现实[8]。

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有关儒家文化与管理现代化关系问题的基本假设，则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这些假设既是我们对现代管理理论的一种真实认定，又是我们对儒家文化研究的逻辑起点。

第一套假设涉及现代管理的基本问题，它奠定了管理原理的基础：

一、管理对各种组织而言是一种特定而且特别的工具。

二、不存在惟一正确的组织形态，而应当寻找适合任务的组织结构。

三、没有惟一正确的方法来管理“人”；管理的出发点是“管理绩效”而不是“管理人”。

第二套假设涉及儒家文化的基本问题，它奠定了与管理现代化关系的基础：

一、儒家文化是一种特定而且特殊的管理文化，这种特定性确定了它的适用范围。

二、儒家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特定的，因而这种管理思想所涉及的组织形态和制度安排必然也是特定的。

三、儒家文化特定的管理思想来源于特定的事实认定，这种事实认定的出发点是关于人性问题的基本假设。

假如我们认定上述两套假设的事实成为真实，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事实的比较分析中探讨儒家文化与现代管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的研究首先要从儒家文化产生和形成的历史背景出发，考察这种历史文化背景下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因素。这些因素是构成儒家文化特定性的“生态环境”，它对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然后我们将研究儒家文化中所包含的管理思想，这种研究不是用儒家经典语言来引证某些个别的观点，而是从儒家文化的整体性出发来探讨儒家文化中管理思想的内在结构以及它对于组织的制度安排和组织的管理方法所做的贡献。这种贡献不仅在理论上具有完整的形态，而且在实务上具有现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研究那些形成和确立儒家文化思想内容的基本假设，这一部分是探讨儒家文化与管理现代化的关键，因为它决定了儒家文化形成的基本范式。对于儒家文化中的管理思想而言，也许最重要的就

是基本假设，而假设对于事实的真实认定才形成了儒家文化所特有的管理思想和观念形态。接下来研究的将是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历史的社会影响，这种影响确定了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管理和经济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探讨儒家文化在何种意义上对于现代管理有用或有效。而这正是我们最后所要研究的现代管理需要的儒家文化。

出于这样的考虑，本研究则安排了如下的形式结构：第一章是导论，在对儒家文化发展变迁所引发的论争中确定了我们立论的基础；第二章是儒家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考察了儒家文化产生的社会历史因素及形成过程；第三章是儒家文化包含的管理思想，探讨了儒家管理思想的内在结构及其组成要素；第四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假设，说明了这种假设是如何影响儒家管理思想的形成及其性质；第五章是儒家管理思想的社会影响，分析了儒家管理思想在中国管理实践中的地位和作用；第六章是现代管理需要的儒家文化，对儒家文化如何走向管理现代化的问题提出可供人们思考的途径；第七章是儒家文化的时代价值，讲述了在不同背景下儒家文化的境遇及其价值；第八章是儒家文化的创新发展，探究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文化创新发展的可能性及其发展前景；第九章是结语，是对本研究所作的简要回顾和简要总结。毫无疑问，本研究无论在立论上，还是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上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疏漏，但相信也能够给从事儒家文化与管理现代化关系问题研究的人们提供某种启示或裨益。

第二章　儒家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

儒家文化产生和形成的历史时代，正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割据、诸侯争霸、战乱频仍、社会失范的大变革时期。历史的风云突变，社会的动荡不堪，王室权威的衰败没落，诸侯列国的称雄争霸，不仅为社会的转型变革提供了可能条件，而且为当时思想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儒家文化的产生连同诸子百家的兴起，正是这一时期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产物。其中有两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构成了这些思想文化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一是这一时期的社会转型变革问题；二是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下移问题。这两个方面的重要因素共同促成了当时百家争鸣的局面和各种思想文化的产生。

第一节　儒家文化产生的社会基础

儒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无疑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变迁有关。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对这一观点已有明确认定“：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这一论断说明了当时社会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史变迁的事实。许多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指出，当时的社会变革正是中国历史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期。这种过渡最明显的标志是表现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经济上最重要的变化首先表现在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土地私有制彻底摧毁了自殷周以来土地归王室所有的世袭分封制现象，改变了西周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历史状况。公元前 594 年在鲁国实行的“初税亩”制度，不仅是这一时期土地制度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而且也是这一时期土地私有制合法化的事实确认。“初者何？始也。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1]“鲁自宣公税亩。又逐亩什取其一。则为十而取其二矣。”[2]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一方面使人们利用各种机会扩大对土地的占有；另方面使诸侯通过各种手段积累私人财富。随着铁器农具的出现，牛耕生产的进一步扩大，水利灌溉设施的运用，使作为封建生产方式基础的一家一户为单位的个体生产成为可能，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起来。经济领域的变化必然引起政治领域的适应性变革。原来周天子统一号令天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政治秩序和管理制度自然成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桎梏。经济上获得相对独立并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开始不满于这种政治束缚，于是凭借各自的实力和财富“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始了称雄争霸、夺权兼并的战争。“天下无道”、“陪臣执国命”已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特征；“礼崩乐坏”、“诸侯僭越”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现象。诸侯之间的兼并称霸，大夫之间的夺权倾轧，父子兄弟之间的相争残杀更是当时历史的真实写照[3]。这一方面说明，王室开始衰微，周天子已失去了控制全国权力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新兴封建势力正在积蓄力量，企图突破阻碍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政治秩序。新兴力量的当权强烈地冲击着殷周以来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氏族政治结构和制度安排，使封建中央集权制下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安排逐

步确立起来。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央集权制下的郡县制逐步取代了殷周以来分封制下的采邑制。中国自殷以来，分封制就已实行，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的基本制度安排。“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4]西周以来实行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的分封制度[5]。通过分封，周王同姓、母弟和异姓功臣于各要冲地区建立了封国。周王朝通过血缘及姻亲关系加强王朝与封国的联系，以“命卿”之制[6]，巡狩、设监等方式加强对封国的统治和管理。封国的“报政王朝”[7]，贡纳、从王出兵等政治、经济和军事义务则包含着对王朝的政治从属。这种基本的制度安排意味着“天下共主”的社会政治结构形式在这一时期的巩固和强化。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巨变使分封制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央集权的郡县制逐渐取代了分封制下的采邑制。春秋初年，秦、楚、晋等大国在新兼并之地，往往不再分封给卿大夫为采邑，而是设置直接由国君控制的县，以加强边境地区的军事防御。《左传》成公七年载楚围宋之役，“子重请取申、吕为赏田”，公申巫臣曰：“不可。此申、吕所以邑也，是以为赋，以御北方。若取之，是无申、吕也，晋、郑必至于汉”。楚王便没有答允子重。可见申、吕之类的县已有别于国君封赏给臣下的采邑，成为国君直接统治的边防军事重镇。郡县从出现到形成一套完整的管理体制的过程贯穿于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制度变迁的重要标识。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封建制下的选任制逐渐取代了奴隶制下的世官制。世官制就是指贵族世代为官，是西周政权选任官吏的基本制度。其核心是宗法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嫡长子继承制。即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8]“文王孙子，本枝百世，凡周之士，不(丕)显亦世。”[9]《诗·大雅·文王》的这种记载概

括地反映了周代贵州累世为官不衰的事实。《史记》、《诗经》等古文献也有具体反映周召二公及其后世为王官的情形，西周铭器屡见诸王每每以王朝旧臣毕生服役于王家之典范勉励其后代子孙。铭文习见王官新旧更新之际，乃由王以册命形式加以法权上的认可。至春秋战国时期，争霸战争愈演愈烈，各个诸侯国为富国强兵而寻觅人才。这样以来曾经是周王室巩固其统治的重要基础的世官制，在春秋战国之际逐渐走向其反面。世官制之所以走向其反面，一方面是随时间推移，原先新近的血缘关系日渐疏远，血缘纽带的维持作用日趋衰微。诚如李斯所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周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10] 这就意味着以前蕴含于世官制中可资利用的血缘关系因素的功用已日渐失去。另一方面，曾经势力弱小必须依赖王室或公室庇护的各级贵族，在世官制下通过累世经代的发展而渐渐强大起来。羽翼丰满的强宗大族已不再依赖王室或公室，王室或公室反而成为其扩张政治、经济和军事权益的障碍。春秋时期齐桓公率先实行选任制改革。《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把任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发布“命令”要地方基层官“进贤”。齐桓公还在葵丘之盟中规定“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禁止官位世袭、兼职揽权。封官必得真人,正是齐桓公“以才任官”思想的明确体现。自春秋后期以来，学术下移，私学兴起，长期以来积累的统治经验随文化的流传而传播，一般平民均有可能通过学习掌握统治经验，出身于下层平民的人才开始大量涌现，这就为废除世官制创造了可能条件。据《史记·儒林传》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孔子的学生中,以下层平民居多,上层贵族为少,说明选贤任能已成为当时各国变法图强的首要问题。据此可以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巨变和制度变迁为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形成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第二节　　儒家文化产生的文化背景

毫无疑问，儒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也与当时的文化下移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有关。由于政治经济上的深刻变化，原来“学在官府”的文化格局也相应地发生了较大变化。王室衰微、制度变迁导致了官学腐败、文化下移。其中最明显的特征在于私学的出现与兴起。原来专管占卜、祭祀的文化官员开始流散民间，其中一些人开始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传授给别人。由于私学的兴起、文化的下移，逐渐形成了“士”阶层的群体，成为社会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士”阶层的出现无疑使当时的思想文化下移产生了两方面的实际效果。一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有了较大突破。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自殷商以来,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主要是‘天命’论及其比较模糊的‘德’意识:“殷人尊师,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11]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疆,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诬共逆于人,用静吉,用作凶。”[12]这说明直到殷商时期，中国人在外部世界面前思想上还完全是被动的，还没有把自己从外部世界中分离出来，没有把自己作为主体去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这种情况在西周初年有了突破性变化，“天命”思想开始发生了动摇。由商代夏而起，周代商而兴的历史事实，使人们对“秉承天命”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怀疑，初步认识到“天命糜

常’的基本道理,初步意识到‘命’与‘德’之间的内在关系[13]。“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14]“聿修厥德,永言配命”,[15]‘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6],“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7]于是便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观念。这说明周人的思想观念开始从天命思想中摆脱出来，逐渐认识到自己应该怎样去做。到春秋战国时期，天命鬼神的地位进一步削弱，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人们把主要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现实人事上来。“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国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18]“季梁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19]“天道远，人道弥。非所及也，何以知之。”[20]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观念支配下，实际政治生活中也就能够提出种种政治主张和管理思想。与“天命”观念的变化相适应，西周时期比较模糊的“德”意识在春秋时期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不仅有了“忠、信、孝、义’等观念,而且也有了‘仁、知、勇’以及‘不朽’等思想[21]。这对以后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是文化典籍的整理有了实质进展。从历史文献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最古老的典籍资料大都形成于这一历史时期。孔子曾以六艺教弟子,删诗书,修易礼,编春秋,正乐经,使自上古以来至商周春秋这一时期形成的文化典籍臻于完备。诗，是西周至春秋时期诗歌的合集;书,是我国上古几个朝代历史文件的汇编;易,成书约在殷商之间;春秋,则是春秋时期鲁国史官记载的史书;至于礼,夏商二代已有，西周初年周公制礼，成为当时重要的政治制度和规范仪式，从而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形成积累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2]正好反映了孔子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赞赏和心态，这些材料说明了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末年，在大约五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在逐步摆脱天命思想的过程中，思想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虽然这些思想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体

系，但毕竟为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形成，以及为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第三节　儒家文化形成的基本过程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和文化背景下，儒家文化及其诸子百家应运而生。一方面社会的变革动荡给人们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予以解决；一方面思想文化的下移发展给人们回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这样的社会历史现实，心存“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把国家的前途命运置于人生的前途命运之上，来思考和回答现实生活中人们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的兴旺发达和繁荣昌盛就成为当时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历史重任。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历史局面。

所谓百家，只是形容其多，其实主要的约在十家左右。汉代司马谈举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23]　班固则举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等九家[24]。各家主张各有不同，而在不同之中又有其相同之点。对于先秦各家思想的要旨，《史记·太史公自序》有如这样的评述“:易大传曰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尝窃观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而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